

中外关系历史变迁中的奥运报道*

——围绕《人民日报》奥运报道的研究

■ 刘朋何辉

【内容摘要】 作为中国中央媒体的代表之一,《人民日报》对奥运会 60 余年的报道折射了新闻传播和体育、中外关系的复杂关系。本文试图围绕《人民日报》对奥运会的相关报道,通过对文本的解读,从历史的角度探讨官方报道与中外关系的关联,揭示在复杂多变的中外关系中,中国中央媒体对奥运的报道是如何一步步成长和发展到北京奥运会时期和当下状态的。

【关键词】 奥运报道; 中外关系; 人民日报

奥运会对中国而言有着特别的意义,中国与之百年的纠葛,反映了中外关系的历史变迁,并深刻影响了中国媒体的奥运报道。《人民日报》60 余年奥运报道历史^①,前三十年是中国反复争取获得国际公正待遇,包括以报道进行斗争和批判的方式;后三十年则围绕中国融入世界遭遇的各类政治麻烦和政治干扰不断进行解释说明。

一、1949 - 1978 年间的中国奥运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之初就表现出了对奥运会的浓厚兴趣,《人民日报》持续报道了中国参加奥运会的各类细节。但是,由于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中国与奥运会的关系始终被政治问题所困扰。首先浮现的就是中国在奥运会参赛的代表权问题。《人民日报》完整地呈现了中国中央政府与台湾当局在这一问题上的斗争。

新中国首次参加的奥运会是 1952 年赫尔辛基奥运会,但这次奥运会中国较晚才取得参赛资格,代表团仓促参加。尽管如此,《人民日报》对这次赛事仍然非常关注。但总体上,《人民日报》仍然一边倒地介绍苏联、东欧等国家的参赛表现。这一现象显示了官方媒体刻意的导向性,即向国内民众宣传社会主义国家的体育成就。

此时《人民日报》完全从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来组织报道,苏联在报道中的位置要排在中国前面,并且报道的分量也远远大于中国。这个时候的官方媒体,在奥运会的报道中尚缺乏自信,受长期体育落后的影响,面对体育强国的苏联(在该次奥运会中得分排名第一),中国官方宣传不敢对自身的出现做出更多的评论和阐发。

1956 年,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允许台湾运动员以“Formosa - CHINA”名义参加第 16 届奥运会,中国被迫放弃参加墨尔本奥运会。官方媒体对此次奥运会较少报道。

两年后,1958 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同国际奥委会断绝关系的声明。

整个 20 世纪 60 年代到 1975 年前后,中国官方媒体关于奥运会的报道基本上是围绕两个线索展开的,一个是中国的代表权问题,不仅如此,在此问题未被解决前,它一直是中国与国际奥委会激烈冲突的根本原因。由于代表权问题的存在,中国将国际奥委会视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由此引起第二个线索的出现,即支持反帝国主义的亚非合作,中国将体育与国际反帝斗争紧密结合,《人民日报》加大了这一视角的报道力度,奥运会的认知彻底政治化了。这与整个中国的政治气氛完全一致,官方宣传努力推动奥运会的政治化理解。1962 年中国体委就国际奥委会禁止印尼参加奥运会发表声明,全文登载在《人民日报》上,鲜明提出“摆脱帝国主义对各国,特别是对新兴国家体育事业的控制,打破帝国主义对国际体育活动的垄断和操纵”^②。

这个时候,苏联悄悄在报道中消失了,塔斯社也不是新闻报道的重要信息源。同时,中国在号召亚非拉团结反帝的过程中找到了自信,开始大规模发表自己的观点,且语言充满了战斗性。

在中国参加了新兴力量运动会之后,中国政府对待奥运会的态度转变了,中国在政策上不再尝试加入奥运会,甚至刻意与奥运会保持距离。此时的官方宣传不仅不强调体育与政治无关,而是逐渐把体育与政治相连,甚至报道了印尼体育部长的话,“体育同政治是分不开的”,“在印度尼西亚,体育是革命的一个重要部分”,“新运会是一种革命思想,我们应当以革命精神和方式加以发展”。^③《人民日报》也登载了出席新运会理事会议的中国代表黄中的话:“新运会是当今唯一公开宣布其政治主张、高举独立自主、反帝反殖大旗的世界性体育组织。这是新运会区别于任何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京奥运会的新闻报道研究”(项目编号:09CXW003)、中国传播能力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的研究成果。

其他国际体育团体的第一个特点。”^④中国官方媒体不仅不将体育与政治相分离,而是批判将体育与政治相分离的观念。《人民日报》登载的这篇中国代表的发言,实际上是此后长达十余年的中国激进体育报道观的一个开始。1966年8月,中国公开声称不再与国际奥委会发生任何联系^⑤。

1968年,“苏修”也进入了中国在与国际奥委会斗争的舆论视线,在篇名为《国际奥委会是美帝操纵的御用工具》的评论文章中,称“苏修叛徒集团扮演了两面派的卑鄙角色。”^⑥中国的官方媒体开始在体育评论中同时对准了美国和苏联。但是此后围绕奥运会的斗争在文革期间并没有在媒体上引起关注,一方面中国已经放弃了与国际奥委会的联系,连“斗争”也没有了。另一方面,中国进入了文革的混乱,体育也完全混乱了。一直到1972年,由于国际奥委会允许罗德西亚参加比赛,奥运会再次引起中国官方舆论的关注,同样也是因为政治引发了奥运争议。

1975年的一篇《苏修在国际体育事务中的丑恶行径》的文章是《人民日报》批判“苏修”的专门性文章,此后围绕奥运议题,尤其是中国代表权问题,相关的批判性文章频繁出现。而美国却很少出现,西方帝国主义不再是唯一的批判矛头,“社会帝国主义”在官方宣传中排在了前面,尽管中国代表权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但中国官方媒体对美国的批判的确确静下来很多。仅仅依据报道文本无法分析这种原因,但是宏观政治的大背景,即中美接近,中苏矛盾持续激化,确与这种情况保持了完全一致,政治再次左右了体育事务的报道。一个技术性的佐证是,苏联运动员在奥运比赛中的作弊被作为极少的奥运比赛新闻刊登出来,而建国之初,享有这种类似关注度的是美国运动员。正常的和纯粹的体育思维已经完全消失,革命观的体育认知和极端左倾的思维左右了官方宣传,一些运动员的作弊被视为“完全是苏修叛徒集团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推行社会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必然结果。”^⑦

二、奥运报道回归理性

1979年对中国奥运事业和中国奥运报道来说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一方面,“名古屋决议”通过后,中国正式进入奥运大家庭;而另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中国官方媒体开始以实事求是和非政治的思维来看待体育,《美国的体育》的报道出现在了《人民日报》上^⑧,美国的体育运动获得积极客观的评价,尤其是奥运比赛的重大成就,全文没有任何政治思维的导向,中国的奥运报道开始有所变化。11月,《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我国同国际奥委会的关系》^⑨的文章,署名为“体宣”,全面回顾了从1924年到1979年的中国与国际奥委会之间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全文没有任何革命式的语言,也没有点任何国家和人士的名,以一种相对平和理性的态度描述。官方报道中,针对国际奥委会的斗争宣传基本结束。此后,中国官方媒体的奥运报道的核心转向了,体育取代政治作为主

调。28日,《人民日报》用大量的报道来介绍奥运会和中国的官方态度,第一版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文中说“国际奥委会已就我国奥委会的代表权问题作出了一个现实可行的决议”^⑩，“现实可行”这个并列词汇解释了中国的围绕体育问题的政治立场的新观念,一种不同以往的现实主义的思维。一种“新时期、新任务”“现实可行”“学习外国体育界的先进经验”的宣传思路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官方宣传的基本立场。

尽管中国已经重返奥运会展开了全国性的体育动员,但是,中国却碰到了国际社会联合抵制莫斯科奥运会。

到洛杉矶奥运会,由于中美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半结盟状态,因此,除了苏联抵制参加被视为美苏之间的事务,官方的报道没有进行政治角度的解读,而是侧重渲染中国三十年来首次参加奥运会的热情。美国在官方媒体上的形象也前所未有的好,报道甚至赞扬美国洛杉矶奥运会的筹办者们“他们的满腔热情、高度组织才能和不畏艰难的工作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⑪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关系奉行现实主义的基本思路,加之中美关系的推进,使得中国可以以体育的视角看待奥运,洛杉矶奥运会在中国官方宣传中基本是一个单一体育视角的奥运会。

洛杉矶奥运会实际上是中国第一次正式参加奥运会,因为建国之初的赫尔辛基奥运会上中国队并没有能够参加正式比赛。不仅如此,洛杉矶奥运会还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参加的第一场奥运会。中国官方舆论表露出两种态度,一方面中国在体育方面有了自信,已经完全没有了对个别“大国体育”的崇拜和底气不足。《人民日报》在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式评论说“中国体育正在世界崛起。可以预言,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华健儿在奥运会上必将大显身手,赢得越来越大的荣誉。”^⑫另一方面,中国实事求是并锐意进取的体育精神也表现了出来“我国在世界体坛发挥的作用还是有限的。中国代表团的同志将执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将抓住这个机会,密切注视和悉心研究世界体育发展的新动向、新潮流,注意吸收各国各地区运动员的先进技术和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⑬这两个基本的态度,在建国之初是没有的,在激进的文革时代及其前后也是没有的,它主导了中国上下看待中国体育发展的基本思路,成为主流舆论。

这场中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参与的奥运会,中国官方媒体也得以从体育角度进行报道,得以宣传中国运动的体育成绩和精神。其报道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视角之多样、观点之多元都是建国之初的那场奥运报道所完全无法比拟的。洛杉矶奥运会是中国媒体第一次的真正系统全面的奥运报道,而不是有刻意倾向的报道,它是中国当代奥运报道的真正起点,此后的奥运会报道基本都从这一基础加以丰富和创新。

1987年1月,官方宣传透露出中国不仅正在认真考虑申办2000年奥运会,也正认真考虑在2002年举办世界杯足

球大赛。^④无论是奥运会还是足球世界杯,中国都受到体育组织热情鼓励申办的激励,这种中国与国际体育组织的友好关系,标志着中国在80年代已经完全正常化参与国际体育运动。

汉城奥运会前,《人民日报》以一场三人对话的形式连载了对奥运奖牌数量讨论的报道。该报道中,无论对美国还是苏联,都不再从意识形态和政治的角度解读,而仅仅就体育本身而讨论,并且非常客观地承认了两国在体育方面具有的领先优势。《人民日报》在汉城奥运会开幕式当天的评论上清晰地表达的是“参与”和“学习”的态度^⑤。

到1991年3月9日《人民日报》报道确定26日“中国决定申办二〇〇〇年奥运会”^⑥,10日《人民日报》对此作了“历史性抉择”的评论报道^⑦,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十余年的发展,国力、体育水平和中国融入世界的程度都有了很大改善,中国官方宣传开始表现出做出更大贡献的雄心^⑧,亚运会成功举办也给予了这种自信^⑨。到1992年,中国官方宣传在表达奥运会的期待时更加自信,一方面中国更愿意表达改革开放的勇气^⑩,另一方面中国相信自己的体育进步。在巴塞罗那奥运会前夕,《人民日报》报道称中国要在本次奥运会上全面超越汉城奥运会^⑪。

三、爱国主义与舆论的自信与包容

围绕申奥,官方媒体的很多报道透露出乐观心态,内容多围绕国际上和国内对中国申奥的支持和热情^⑫,因此,申奥失败确实让中国社会大吃一惊,很多人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很多青年人产生了对西方的强烈不信任和对国家自尊的激烈维护^⑬,后来这种情感经历一系列中美关系的冲突,而在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炸后被激发出来,并长期影响着中外关系的发展。

1992年9月23日,中国未能获得2000年奥运主办权,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刊出了多篇报道,其中舆论引导性的评论文章就有两篇。两篇文章以带有很强遗憾感的笔调坚定地强调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融入世界的决心^⑭。但是,此时官方宣传和大众心理产生了重大的不同,官方尚能够理性认知,而大众心理则难以接受,各种对外部世界的怀疑出现了,这种怀疑集中体现在《中国可以说不》这类书中。这种怀疑大不同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思维,这是一种全新的怀疑,由对本国的自信(基于十余年的发展)和对外部的失望相结合,逐步在大众舆论中发酵。

到了1996年8月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国官方媒体对奥运和美国的认识加深了,由最初的好奇、不满和到改革开放后的学习,此时的中国官方报道已经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看待奥运会和美国^⑮。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官方报道愈加强烈地从爱国主义的视角来看待和解读奥运会,体育竞技成绩成为了国家荣誉的一个重要方面,《人民日报》的社论将这种态度展示的淋漓尽致:社论称,“正是因为永恒的爱国

主义精神,才使奥林匹克运动青春永驻,魅力无穷。”中国选手的奋斗故事“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这就是爱国主义!”这种直白的舆论造势和体育意识形态需要经历此后若干年中国民间社会大众意识的觉醒来逐步消解,中国奥运观的真正体育化仍然需要一个从官方到社会的调整。这种意识形态在某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例中被集中审视,这个事例就是2010年周洋在冬奥会上一番真情表露引发的争议^⑯。“夺冠前无人问津,拿奖后扎堆献花”的社会反思和批判带来了中国体育观的重大进步。但是,无论如何,奥运和体育都被中国从官方到民间赋予了太多非体育的成分。正如《人民日报》另一篇评论文章揭示的,“中国运动员都深深地懂得,胜利不仅是今日的辉煌,它还包含着太厚重的历史情结。”^⑰这种情结制造了过度的竞技压力和负担。它的消除,依赖中国在对外关系中不断胜利积累的自信和大度,从而消解历史上中国与西方交往中不断累积的挫败感和怨气。

1999年1月6日,中国决定申办2008年奥运会,官方媒体一开始就引导舆论建立良好的申办观“我们一定要树立正确的申办观,以更加宽广的胸怀、更加成熟的心态、更加有利的方式参与申办、支持申办。”^⑱在中国崛起愈发显著的状态下,中国对待国际事务的心态变了,申办奥运会依然很重要,但是中国已经不需要借助这项赛事来证明自己。悉尼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取得重大的进步,《人民日报》称之为历史性突破,中国体育在奥运会上节节上升的成绩成为中国国际自豪的一个重要方面。

2000年10月5日《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继续为中国申奥摇旗呐喊^⑲,但其口吻和气度已经全然不同于以往。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结束之际,《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充满了对申办奥运成功的期待和迫切,以及暗含的中国的不太充足的底气。文章说,“深切感到一定要把经济搞上去,有了强大的实力,办奥运会才有坚实的基础”;“同时诚心诚意地向外国学习,向巴塞罗那学习”^⑳。然而,到了新世纪,此时的申奥评论是“北京完全有能力办成高水平奥运会”。不到十年的市场经济,中国的整体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已经大不同于以往,官方和国民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中外关系中很长时间中国缺少自信的感觉已经改观。

申奥成功带给国人非常大的荣誉感,中国也确实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和诚意努力办一届高水平的奥运会。但是,北京奥运会被过度政治化,圣火传递遭遇干扰,这引发了国内从官方舆论到大众舆论的不解和愤怒,中国再次对西方感到失望,中国的民族主义再次找到了存在的依据。这为西方的自由主义者深感不解,他们眼中的中国青年本应该是不支持政府的。官方宣传和大众舆论这个时候走到了一块,官方组织的圣火传递受到旅外中国青年的自发保护。奥运火炬传递在伦敦遭到藏独分子干扰后,《人民日报》将网民的评论放到了第二版的国内要闻的重要位置,少见地借用大众舆论表达官方态度^㉑。此后,多次引用网上

评论来进行舆论宣传^②。火炬传递最终演变为了海外中国人爱国主义的大动员,留学生和华人的自发护卫圣火的行为受到官方舆论的赞扬。当护卫火炬的行动发展到国内抵制家乐福的大规模群众事件后,官方宣传开始调控舆论,防止失控^③。

尽管少数西方人士和政客宣扬抵制北京奥运会,但中国官方媒体始终保持了克制,官方媒体的报道和评论看不到对西方国家的愤怒,中国政府对外部世界没有了敌意,中国全然希望融入世界。不仅如此,中国的世界观也在变化,简言之,中国认识到自己需要世界,同时也强烈感到世界需要中国,这种民族自豪和自信反映在了中国官方宣传的字里行间,“虽然世界上不同地方的人们在不同的问题上持有不同看法,但绝大多数人相信,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④;“我们用最精密的尺度去扫描向国际社会许下的每一个承诺,用炽热的情感和宽广的胸怀拥抱世界。”^⑤

到2012年伦敦奥运会结束时,《人民日报》的社论对中国人看待奥运的评价,也同样适合这家官方媒体本身,《人民日报》的奥运会报道就中外关系而言确实“视野更宽广、心态更包容、胸怀更开放”^⑥了。

四、结语

纯粹体育化的奥运和奥运报道较少出现,它难免摆脱国家间关系的影响。中国官方舆论的报道趋势展示了这一逻辑,在政治问题没有解决好之前,官方媒体上的体育事件往往升级为政治事件。对奥运会这类重大赛事尤其如此。因此,建国后的前三十年,中国对奥运相关事务的报道,基本上是政治,极少有纯粹的体育。而后三十年,中国逐步与外部世界正常化,这使得纯粹的体育视角占到较大篇幅,

而奥运报道也日趋多样化。总体来看,中国从一开始并不想对奥运会投入过分的政治视角,但是客观遭遇令报道被迫政治化,后来中国回顾当时历史时用“忍无可忍”^⑦来形容这种感受。此后,中国国内的形势极左化之后,奥运报道也激进化了。改革开放之后,摆脱意识形态影响的中国始终努力使奥运摆脱政治议题,但是,外部世界的干扰和压力使得官方媒体不得不站出来进行政治辩论和解释。

官方舆论曾经有两次表现出强烈的自信:一次是在文革期间,官方媒体完全以引领世界体育革命的方式来看待与国际奥委会的斗争,这种自我陶醉的意识形态狂热随着打开国门而迅速消退,转变为对与西方差距的强烈震动;而经过改革开放的长期努力,第二次申奥时,中国再次找到了自信,这来源于实实在在的国力和体育成绩。中国官方舆论两度由不自信到自信,一次是激进意识形态的支撑,一次是国家强盛的力量。两种自信都遭遇了现实挑战,前者制造了不切实际的舆论狂热,后者易引发难以控制的民族主义的反弹;而一种真正自信的奥运报道,可能要依赖持久和有吸引力的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双重保障。

《人民日报》60余年的奥运报道有两个基本的启示:其一,刻意对奥运进行政治解读难免导致空洞的宣传,而一味讲求奥运的纯粹体育化,也忽视了这个赛事是以民族国家的符号参与的。因此,冷静地看待这一民族国家间的体育比赛才能避免报道走入误区,减少体育比赛升级为政治游戏。其二,大型国际赛事的报道常常引发国民的关注,但是赛事本身正是依靠其竞争性和不确定性来吸引人,这恰恰容易引起大众情绪的突变。这种情况越来越出现在中国当代社会,因此,媒体在体育报道和评论中应避免过激的话语,而更多去努力培养理性的公民和宽容的舆论环境。

注释:

- ① 20世纪50-80年代《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曾大量采用新华社提供的信息,因此,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官方的媒体、宣传、报道等也包含了登载在《人民日报》上的新华社的报道。
- ② 《我体委和体总谴责国际奥委会非法禁止印度尼西亚参加奥运会》,《人民日报》,1963年2月13日,第4版。
- ③ 《马拉迪说新兴力量同帝国主义不能和平共处》,《人民日报》,1964年11月17日。
- ④ 《我代表团副团长黄中在新运会理事会会议上发言》,《人民日报》,1965年9月24日,第3版。
- ⑤ 《中国人民绝不同国际奥委会发生任何联系》,《人民日报》,1966年8月15日,第6版。
- ⑥ 《国际奥委会是美帝操纵的御用工具》,《人民日报》,1968年3月18日,第6版。
- ⑦ 《霸权主义者的“高超”表演》,《人民日报》,1976年8月4日,第6版。
- ⑧ 《美国的体育》,《人民日报》,1979年8月12日,第4版。
- ⑨ 《我国同国际奥委会的关系》,《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7日,第6版。
- ⑩ 《新形势 新任务》,《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8日,第1版。
- ⑪ 《洛杉矶迎接奥运会》,《人民日报》,1984年4月29日,第7版。
- ⑫⑬ 《和平·友谊·团结·进取》,《人民日报》,1984年7月29日,第1版。
- ⑭ 《中国体育加快步伐走向世界》,《人民日报》,1987年1月10日,第3版。
- ⑮ 《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本报评论)》,《人民日报》,1988年9月17日,第1版。
- ⑯ 《中国决定申办二〇〇〇年奥运会》,《人民日报》,1991年3月9日,第1版。
- ⑰⑱ 《历史性抉择》,《人民日报》,1991年3月10日,第4版。

(下转第72页)

不是依据相关法律对公民行为的最高认可和褒奖,是以媒体价值标准为核心的“感动”,这种“感动”和社会主流认知以及中国人对“感动”的深沈理解存在一定的差异。年度人物评选结果显示,除了地区和年龄外,人物的背景、身份、职业、地位的边界已经模糊,更多体现全人类的精神世界。当然,《感动中国》是由国家级主流媒体举办,其本意在于舆论导向和社会激励。但要实现对社会人际高尚道德关系的权威确立,需要尽量矫正市场配置资源的失衡,

逐步完善稳定的专业评价机构和评价体系,避免让荣誉制度有过度的社会承重。

《感动中国》公益传播的显性传播与价值的隐性诉求相辅相成,如果单有隐性诉求公众将仅停留在“感”的层面,如果单有显性传播则缺乏“动”的源动力,因此,只有两者交融方能“感动”中国。在社会荣誉分配的公益表达中,公众的自主意识的觉醒,价值诉求及价值认同的有效实现,需要更理性和艺术的媒介叙事。

注释:

- ① 2012年《综艺》年度节目评选活动的年度特别节目《感动中国》,《综艺》,2012年第7期。
- ②⑩ 埃米尔·涂尔干著《社会分工论》,渠东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89-90、582页。
- ③ 丁柏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中国传播的定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 ④ Robert A·Hackett、William K·Carroll《媒介重构:公共传播的民主化运动》,李异平、李波译,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 ⑤ 闫洁、蓝东兴《新闻文本开放式与封闭式的传播机理》,《新闻界》,2013年第1期。
- ⑥ 伍俊斌《公民社会基础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06页。
- ⑦⑨ R.K.默顿著《科学社会学》,鲁旭东、林聚任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80页。
- ⑧ 邓力《新闻导向功能的隐性表达》,《西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 ⑪ 程前《电视媒体灾害报道的话语变迁——基于央视三个不同年代报道样本的内容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作者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国涛】

(上接第67页)

- ⑬ 《满怀信心申办2000年奥运会》,《人民日报》,1991年4月4日,第4版。
- ⑭ 《一个更开放的中国期待二〇〇〇年奥运会》,《人民日报》,1992年5月15日第4版。
- ⑮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京举行动员大会》,《人民日报》,1992年7月1日,第4版。
- ⑯ 《柏林奥运会申办负责人承认北京和悉尼是最强劲对手》,《人民日报》,1993年2月4日,第4版 《决心大 难度大 希望大 张百发说奥运申办竞争呈白热化》,《人民日报》,1993年2月2日,第4版 《陈希同要求北京市民共同奋斗 力争奥运会申办成功》,《人民日报》,1993年1月31日,第4版;以及许多强调北京申奥所具有的多项优势的报道。
- ⑰ 参见宋强、张藏藏、乔边等《中国可以说不一——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版,前言第2页。
- ⑱ 《我们告诉世界——北京不说“再见”》,《人民日报》,1993年9月24日,第4版 《坚定不移地走向世界》,《人民日报》,1993年9月24日,第1版。
- ⑲ 《在美国看奥运 从奥运看美国》,《人民日报》,1996年8月6日第8版。
- ⑳ 《祖国至上——热烈欢迎中国体育代表团载誉凯旋(社论)》,《人民日报》,1996年8月6日,第1版。
- ㉑ 《体育健儿鼓舞我们奋勇向前(人民论坛)》,《人民日报》,1996年8月7日,第4版。
- ㉒ 《真诚的愿望 扎实的工作》,《人民日报》,2000年5月9日,第1版。
- ㉓ 《北京完全有能力办成高水平奥运会》,《人民日报》,2000年10月5日,第1版。
- ㉔ 《北京欢迎你,奥林匹克风》,《人民日报》,1992年8月10日,第1版。
- ㉕ 《“藏独”分子破坏圣火传递是与全世界人民作对》,《人民日报》,2008年4月8日,第2版。
- ㉖ 《奥运精神不容亵渎》,《人民日报》,2008年4月10日,第12版 《闹剧挡不住圣火的辉煌》,《人民日报》,2008年4月9日,第4版。
- ㉗ 《建设好我们的国家是表达爱国热情的最好方式》,《人民日报》,2008年4月20日,第4版。
- ㉘ 《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社论)》,《人民日报》,2008年8月8日,第4版。
- ㉙ 《百年奥运期盼新的辉煌》,《人民日报》,2008年7月25日,第11版。
- ㉚ 《书写奥林匹克更大光荣(社论)》,《人民日报》,2012年8月13日,第1版。
- ㉛ 《世界各国人民和国际体育界友好人士强烈要求国际奥委会驱逐蒋帮恢复我合法席位》,《人民日报》,1975年5月21日,第5版。

(作者刘朋系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讲师;何辉系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张国涛】